

理 论 篇

第一章 劳务与经济增长

第一节 劳务资源与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意味着一个国家包括产品和劳务的产出，即国民生产总值的扩大。增长问题很早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并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内容。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劳务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本章要研究的中心问题。

一、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为三类：

- (1) 劳务的增长；
- (2) 资本的增长；
- (3) 技术的进步。

在不考虑技术进步，也就是产出的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按照柯布一道格拉斯函数 $Q = \lambda K^{\alpha} L^{1-\alpha} (0 < \alpha < 1)$ ，可以得出：

$$\frac{\Delta Q}{Q} = \alpha \frac{\Delta K}{K} + (1-\alpha) \frac{\Delta L}{L}$$

这个方程的含义是，国民经济产出的增加 α 可以用资本的增加来解释，另外 $1-\alpha$ 可用劳务的增加来解释。根据测算 $\alpha = \frac{1}{4}$ ，也就是说劳务增长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资本的三倍。如果考虑了技术变化对产出的影响，模式改为：

$$\frac{\Delta Q}{Q} = a \frac{\Delta K}{K} + b \frac{\Delta L}{L} + \frac{\Delta T}{T} \text{ (这里 } T \text{ 代表技术进步)}$$

现在经济发展的趋势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比如美国 1889—1919 年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有 $2/3$ 是要素投入贡献的，只有 $1/3$ 是技术进步所致。但是 1919—1957 年 恰好翻了过来 技术进步贡献了 $2/3$ 的经济增长。经过研究，发现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技术革新和管理的改进两方面。而技术的革新与管理的进步归根到底来自劳务素质的提高，这也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方法。

因此，一个国家如何充分挖掘与利用资本及劳务，并使这两种稀缺要素资源实现最佳配置，是实现增长的关键。（这里之所以说劳务与资本是稀缺的，是因为劳务与资本并非无限供给，它们可以短缺，也可以不短缺，但必定是稀缺的。）通过调整资本——劳务的比例来改变资本与劳务的报酬，影响它们在生产中的配置，实现资本与劳动者的“充分就业”，实现理想的经济增长。

一个竞争性的劳务市场能够帮助劳务资源的有效配置。假定提供的劳务是同质的 那么 在劳务要素“报酬”即工资率这个杠杆的推动下，劳务会从工资较低的行业或部门流出，流到工资较高的社会经济部门。由于每个企业都在利润最大化的动机驱使下，按照劳动的边际产品等于边际成本（即工资率）原则决定劳务需求，劳务市场在这样的条件下达到均衡：

$$\frac{MPP_1}{W_1} = \frac{MPP_2}{W_2} = \frac{MPP_n}{W_n}$$

MPP_n 是第 n 个企业的边际物质产品， W 是工资率。

在可变的工资率这一“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通过劳务的自由流动与生存竞争机制，实现劳务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最有

效地进行分配，使总产出达到最大化。

二、劳务数量与经济增长

劳务不仅是生产的基本组成要素，同时也构成经济发展所需的市场。劳务数量的多少就从这两个方面来影响经济的增长。

人口本身不等于劳务资源，但却是劳务资源形成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庞大的人口基数是这些民族在世界上立足的重要筹码，庞大的劳务大军使得企业得以用较小的代价就可以获得劳务资源，从而加速资本的积累。但是马尔萨斯却认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虽然这种马尔萨斯人口论不足取，但是发展中国家要改变人民生活水平，摆脱“低水平均衡的陷阱”必须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

决定劳务资源的因素，除了人口的绝对数量以外，以下几项也对资源的总量乃至经济的增长有重要影响。

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决定劳务资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当西方国家步入老龄社会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年龄结构正呈年轻型。发达国家每年巨额赡养费支出是社会发展的包袱。而过二三十年，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将步入老龄化，社会赡养负担问题将更加严峻。

劳务参与率越高，社会能够提供的劳务也越多。劳务参与率和社会文化沉淀及经济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一些东方民族素有勤劳的传统，但是另一方面歧视妇女，把她们拒于就业的大门之外，这是社会劳务资源的流失。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不同性别的劳动参与率（美国 1950—1979 年）。

表 1-1

年 份	16 岁以上男性	16 岁以上女性
1950	86.8	33.9
1960	84.0	37.8
1970	80.6	43.4
1979	78.4	51.1

劳动参与率指的是劳动力占 16 岁以上劳动人口（即潜在的劳动力）中的比例。从表 1-1 中，我们看到美国男子由于教育年限的延长及退休制度普遍施行，劳动参与率有所下降。但由于妇女劳动参与率迅速提高，使得总的劳务资源反而扩大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凡是能为男性与女性提供充分就业机会的国家，其经济也必定较为发达。

三、劳务质量与经济增长

影响劳务资源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是劳务的质量。

关于劳务资源的质量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佐证。

第一，关于吸收外资的能力。人们还记得日本与德国是如何从战后的废墟上站起来的。尽管在战争中受到巨创，但是受过良好训练的人力资源依然存在，他们能够较快地吸收其他发达国家的资金与技术。相反，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素质普遍较差，故吸收资本的能力很差。西方国家之间每年巨额的相互投资，到了发展中国家却成了涓涓细流，这说明低素质的劳动者是吸收外资的障碍。

第二，余值增长率问题。国民收入增长率大于国民资源增长率的部分被称为余值增长率。对于余值增长率的存在，研究者认为主要因素有两个，一个是规模报酬递增规律的作用，一是劳动

者素质的提高。而后一因素被认为是主要因素。

第三，人口膨胀与某些部门的劳务短缺同时存在。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口众多，但大多是低素质的劳动者。在社会存在严重失业的同时，一些技术部门却不得不花大量外汇雇请外国的技术人员。

影响劳务质量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1)健康因素 如发病率，一生平均工作年数；(2)知识；(3)技能；(4)劳动倾向。

如果我们把投资的定义应用于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各种教育和训练，那么劳动者本身就不仅仅具有提供劳务这一作用，他还是资本存量的拥有者——人力资本 这是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训及资本投资在他身上的沉淀。当发展中国家面临资本积累不足的时候，大量的人才流失带走了大量的沉淀在他们身上的人力资本，而发展中国家本可以用这些稀缺的资本投资于工农业生产中。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对劳动者的投资上，得到高质量的劳务，以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

毫无疑问，过于迅速的人口增长削弱了国家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能力。因为高速增长的人口不仅对食品供给产生压力，还强化了对储蓄、外汇储备和人力资源发展的瓶颈，减少了原本可以用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资本积累。

对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并非越多越好，人力资本投资的报酬率也是边际递减的。许多国家由于教育、培训的结构失衡，造成这种投资的收益远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效果，因为只有当边际收益率等于边际成本的时候，人力资本的投资才能达到最优。

这种投资结构的失衡造成的后果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整个教育水平低下，另一方面却出现了“教育过度”和“知

识失业”。

比如许多国家由于对大中学校实行免费或近于免费的教育，致使对教育的需求大大超过了所需的人力资源量。社会对教育的需求膨胀使得教育系统扩张异常迅速，企业又倾向于寻找拥有较高学历的员工，便造成了“文凭攀比”。这样，一方面人才大量闲置，另一方面低水平的教育又拼命扩张以满足社会大众追逐学历、文凭的需求。

因此，不仅要对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改善整个劳务的质量，还要注重投资的效率与质量，改革教育体制，制止人才外流，对有限的资本投资来说，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节 劳务转移与城市化

工业化、现代化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口号。战后，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坚定不移地选择了一条荆棘丛生的现代化之路。这些国家由于受结构主义的影响，一般重视物质资本的积累，重视计划。以印度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国家通过国家的计划，建立起本国的工业体系，体现了一种民族独立自强的愿望。

但是这种过于重视资本积累与经济计划化的结果，是经济上的二元结构。

二元经济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他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分为两大部门：一是采用传统方式生产的部门，二是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部门。前者包括农业及一些小商业，往往位于农村；后者则是集中于城市的民族工业。这种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农村与城市的对抗，构成了经济上的二元对立。工业化、现代化的成果只能被少数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享受，广袤的农村依然十分贫穷。

这种通过牺牲农业（农民）来保护、扶植城市民族工业的做法，虽然也符合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善的实际，但是过于否定市场的做法，使得劳务资源逆配置、经济运行效率低下。农村中大量的显性或隐性失业大军一旦摆脱了僵化的户籍控制制度，就会引起一场从乡村到城市的劳务转移热潮。

一、劳务转移

1954 年，刘易斯发表了一篇题为《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的文章，由此建立“刘易斯模式”。他认为所谓“无限的劳动供给”是指现代工业部门在现行的固定工资水平上能够得到它所需要的任何数量的劳动力。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里，由于人口众多，劳务十分丰富，传统的农业部门并没有资本投入，且土地也很有限，根据边际生产率递减的原理，一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必定降为零。这时候，农业劳动者只能获得相当于维持生存的收入。

工业部门的工资肯定会比农业部门高，但不会高很多，刘易斯估计是 30%。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受农业部门收入限制，由于城乡之间存在着工资差别，只要现代工业部门扩张，就可以按现行不变工资从农村中吸收所需的劳务。在农村全部剩余劳动转移到城市前，劳务供给弹性无穷大。

图 1-1 中， W 是比生存收入略高的现代工业部门工资，在这个工资水平，来自农村的劳务供给是“无限”的。在初始资本为 K_1 时，工业部门能吸收的劳务为 A 。假设资本家利润用于再投资导致资本量从 K_1 增加到 K_2 、 K_3 ，这时工业部门能吸收的劳务从 A 增加到 B 、 C ，这个过程可以持续到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全部被吸收为止，这时农村的劳务供给曲线才转为正常的斜上倾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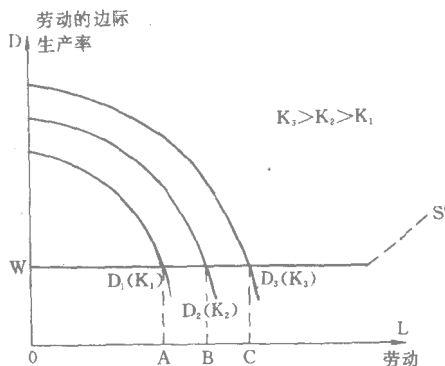


图 1-1

刘易斯这个模式对解释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差异意义很大，但也受到一些批评。比如许多人反对“无限的劳动供给”这种说法，他们认为传统部门生产率虽低，但资源配置是有效的。刘易斯模式只强调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忽视农业的发展，这也是该模式一个要害缺陷。拉尼斯—费景汉模式对其进行了改进。他们把劳务转移分割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劳务转移不会受到阻碍，因为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农业总产出不变。第二阶段劳务转移将受到影响，因为这个阶段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劳务转移将引起农业产出减少，从而引发粮价及工资的上涨。第三阶段农业部门商业化，伪装的失业者将消失。“伪装的失业者”指的是边际生产率小于生存收入以后的那部分劳动者。拉尼斯和费景汉乐观地认为第三阶段的到来将会实现农业资本化。

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劳务转移的第三阶段迟迟不到来。一方面农业部门的滞后影响工业部门的发展，另一方面工业部门

本身吸收劳务能力有限，就业问题依然严重。工业部门吸收剩余劳务的过程受到阻碍而过早停止，可能有如下原因：

首先，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快，是阻碍工业部门扩大的主要因素。发展中国家对农业投入相对较少，而农村人口增长却十分迅速。为了满足国内粮食需求，需要大部分人从事农业。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往往是资本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规模的扩张并不带有同等比例的吸收劳务能力。从这一点说，发展中国家与其把目光盯住“尖”、“精”的技术，不如采用适合国情的、能够多吸收劳务的中间技术。再其次，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购买力低下的农村经济阻碍了工业部门的扩张，因为它无法找到一个可以出清的市场，也就没能更多地吸收劳动力。

二、劳务转移与城市化的模式

在刘易斯与拉尼斯—费景汉的模式中，城市中还存在着制度性的失业是不可想象的。但是 60 年代和 70 年代，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速度并没有减缓。

为了解释城市失业及向城市转移的同时并存，托达罗采用就业概率来说明劳动者的迁移决策。

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行为主要受城乡收入预期差异决定，这种关系可以表示为：

$$M=f(d) \quad f' > 0$$

M 表示从农村迁到城市的人数， d 表示城乡收入预期差异。

在城市中的预期收入等于未来预期实际收入与就业概率的乘积，农业部门预期收入即是未来的实际收入。

$$d = \pi \cdot W - r$$

W 表示城市实际工资率, r 是农村平均实际收入, π 介于 0 到 1 之间, 取决于任何时候城市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与城市的失业人数。

从托达罗的模式中可以知道, 当代发展中国家那么多城市移民甘当失业大军一员, 是因为他们预期在长一点的时间里可以找到工作。从长远来看, 城市预期收入还是比农村预期收入高, 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扩大更加强化了这一刺激。

拉尼斯—费景汉模式与托达罗模式虽然研究内容相同, 但政策含义大相径庭。拉尼斯—费景汉研究的是如何加速城乡劳务转移的进行, 而托达罗则希望通过抑制城乡间劳务转移来解决城市的失业问题,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了解劳务转移的成因、模式有助于制订正确的政策。

城乡劳务转移模式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化的方式。乡村发展的滞后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城市的“偏好”是“城市崇拜”的直接原因。虽然城市化是所有国家的共同选择, 但是我们注意到, 在发达国家行得通的移民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就行不通。究其原因, 一个是他们工业化道路的差异。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是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体的, 能够吸纳较多的劳务, 通过长期循序发展, 成为现代的西方城市。而发展中国家一开始就选择资本密集型的工业以求迅速追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另外, 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要比城市化快得多, 工业中就业人口的比重高于生活在城市人口的比重, 而发展中国家正好相反。

发展中国家“城市病”的现实对“城市崇拜者”是一帖“清醒剂”。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健康的城市化, 使人力资本在城乡间得到合理配置, 有两个相关联的措施。

(1) 通过加强农业发展, 将一部分劳务吸收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 加大农业投入, 引导精耕细作, 发展农村中的非农产业, 改善

农民的生存环境，这就可以引导他们有序地向城市流动。

(2)在城市与城镇的功能界定上避开“越大越好”、“大而全”的一厢情愿。在大城市中发展服务业应当是首要任务，狭义劳务本身就是服务业提供的服务。充分利用第三产业吸收劳务能力强的特点，直接跟上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化的热潮。可以把相关的工业放置在大城市的卫星城镇，这些卫星工业小区通过紧密纽带与大城市相联。至于分布在农村中的城镇、集镇可以帮助农业剩余劳务的就地转移，把就地转移与异地转移结合起来，既解决农村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又减少了现代化、城市化的成本。

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和异地转移到各个城市，一方面对城市的公共设施、文教、娱乐等方面的需求扩张；另一方面，城市的社会分工程度、家庭分化程度，比农村的自给经济大大加强了，创造出许多原本不存在的服务需求，为服务业扩张带来便利条件。

第二章 企业与劳务

第一节 企业与劳务市场

企业为产品市场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与服务的同时，也要从劳务市场获得它所必须的生产要素之一——劳务。为了对劳务市场进行分析，我们作以下假定：

第一，假定所有的劳务是同质的。正如公路交通图的一些省略使我们能将主要路线看得更清楚。

第二，假定企业追求利润是最大化的。短期内调整雇佣的劳动力数，长期内还可以改变资本的数量以谋求利益最大化。

第三，劳务市场和产品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企业只是市场既定价格的接受者。

一、企业的劳务需求

企业的劳务需求与对日用品的需求不同，它是一种依赖于商品需求的派生需求。

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单元。一个雇主考虑是否再增加一名工人，他将比较新增工人的边际物质产品乘以该产品价格的乘积，即边际产品价值 VMP 与必须增支的该工人工资的大小。我们知道，如果任何一个生产要素的数量增加，而所有其他生产要素的数量固定不变，则这个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将下降。而随着劳务投入增加，如果最后一个工人的 VMP 等

于他的工资 这时就达到平衡状态(图 2-1) 这时候的雇佣数目就是均衡时候企业的劳务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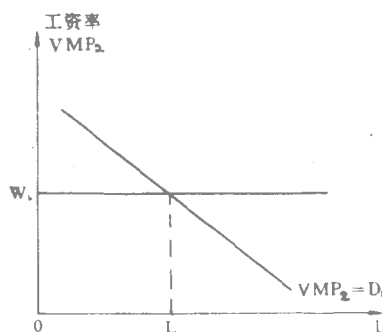


图 2-1

企业的 VMP 曲线实际上就是劳务的需求曲线。

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可以对资本数量进行调整。如果资本和工资价格相对不变,那么资本会按原来的技术关系增加对劳动的需求。

如果资本价格相对工资下降,将会带来“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规模效应使劳动需求扩大,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则会减少劳动的需求。如果资本价格相对工资上涨则恰好相反。

“劳务需求弹性”是指工资率每变动 1% 所引起劳务需求变动的百分比。影响劳务需求弹性的因素有:①技术上越容易以其他要素代替劳务,对劳务的需求弹性就越大;②对用该劳务所生产的产品需求弹性越大,对劳务的需求弹性越大;③劳务成本占总成本的比率越大,对劳务的需求弹性越大;④其他与劳务配给的投入要素供给弹性越大,对劳务的需求弹性越大。

尽管企业的雇佣行为是受利润最大化原则决定的,但随着

企业形式的不同，其需要的劳务也有不同特点。小企业需要的劳务类型往往较为单一，素质要求不高。而大公司需要各种类型的劳务来构成其庞大的劳工“社会”。大公司由于其生产和经营上的特点，对有专长劳务的需求大大高于无特长、普通劳务的需求。小企业的劳务需求往往是十分分散的，而大公司的劳务需求集中程度较高，甚至形成垄断。

以上我们说的是单个企业对劳务的需求，那么整个经济对劳务的需求是各个产业劳务需求的总和。但产业的劳务需求却并非为产业中各企业劳务需求的总和，虽然它是以产业中各企业劳务需求为基础的，但是产业的需求曲线要比作为企业需求基础的 *MRP* 曲线陡些。

二、劳务的供给

人类劳动是社会最大生产资源，且这几乎是每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提供给社会和企业的劳务数量不会是固定的，它不但受社会宏观经济的环境制约，而且最终还要让每一位劳动者根据自己的效用函数作出决策。

我们分两个层次来分析，一个是社会的劳务供给模式，另一个则是个人（或干脆说是家庭）的劳务供给模式。

从整个市场来看，人们对提供的劳务与经济刺激之间的关系（这里假设非金钱因素对劳动者行为没有影响）是有争议的。

在图 2-2(a) 中这一条具无限弹性的供给曲线代表马尔萨斯断定的那种情况：人口增加到把工资压在维持生存的水平。另外，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务供给也是无限弹性的。

图 2-2(b) 是较为正常的情况。图 2-2(c) 可能与在较短时间内发生的情况有关，个人来不及调整自己的工作计划。图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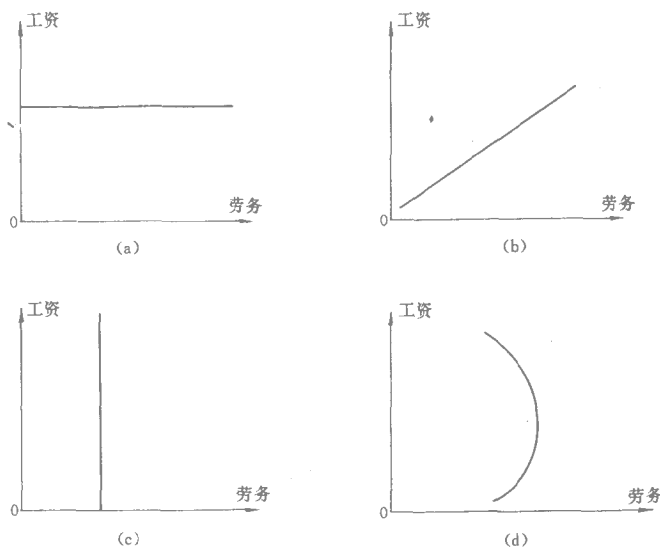


图 2-2

2(d) 被认为是进入后工业社会独有的一种情况，薪金的增长反而导致劳务供给下降。

那么，个人是如何确定自己劳务的数量并影响社会的劳动参与率呢？

家庭被认为是劳务的提供者，家庭不断地生产（出生）再生产保持人的健康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出劳务资源。首先时间是稀缺的，一个人必须在工作与闲暇之间作出选择和分配。假设每增加一个小时工作带来的边际效用是 MU_G ， MU_G 相当于一个小时工资用来购买商品带来的效用。闲暇也能带来效用，假设其边际效用为 MU_L 。 MU_G 与 MU_L 是边际递减的，一个谋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必然会把他的时间分配定在当 $\frac{MU_L}{W} = \frac{MU_G}{P}$